

# 海外民族志的历史、问题与田野策略

## ——基于肯尼亚田野的讨论

齐腾飞\*

**摘要：**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早已起步，然受限于时代，未形成规模和惯例。而今，随着“海外民族志”概念的提出和大陆诸高校推动的海外田野实践，海外民族志渐成规模，并成为中国人类学的一大面向。因历史积淀、人才培养、语言通关等问题，海外民族志尚处于探索期。文章通过肯尼亚田野展示研究者面临的选题焦虑和问题困惑，并讨论田野点选择、研究方法确定和风险规避的策略，为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提供一个案例。

**关键词：**海外民族志；历史；肯尼亚；研究问题；田野策略

近些年，“海外民族志”声名鹊起，在人类学民族学界渐成显学。北大、清华、中央民大等大陆高校的师生负笈海外，做田野调查，撰写民族志，构成中国学界对海外社会的探索之势。海外研究脱离了习以为常的社会秩序，研究者既会被异国风情吸引，也会因海外田野的不确定性而焦虑，甚至抱怨从事民族志的条件越来越窘迫。<sup>①</sup>研究者

---

\* 齐腾飞，深圳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① 迪迪埃·法桑、阿尔邦·班萨主编：《田野调查策略：民族志实践检验》，刘文玲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4页。

破解条件窘迫的方式既要有个体能动性的延展，也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合力。作为学术个体，研究者唯有分享个体的田野经验方能为学术共同体构筑根基。在此之前，研究需要梳理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的历史，明确目前“海外民族志”在整个学术脉络中所处的位置及其特点。

## 一、海外民族志在中国之发轫

“海外民族志”就是去海外做民族志研究，这一概念看似明确，细究却充满各种迷惑。<sup>①</sup> 这些迷惑几乎都是围绕“海外”一词产生的，它包括并不限于：为什么要加“海外”两字？海外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又或是一个人文地理概念？从事在华外国人的田野研究、从事海外华人群体研究属不属于海外民族志？一个移民他国的华人研究非中国文化现象算不算海外民族志？张骞、法显、玄奘、杜环等人的海外游历是不是海外民族志？

若要纵深地理解中国人类学界提出的“海外民族志”概念，则需要回顾整个学科海外研究的历史。人类学诞生伊始伴随的是英法德荷等国的探险、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虽不言海内海外，但研究地域无疑针对海外。美国情况与此不同，建国初期，十三州的欧洲后裔们驾着“西进运动”的马车，与印第安人争夺土地，拓展生存空间。<sup>②</sup> 人类学诞生于美国后，人类学家们关注的主要是生活在北美的印第安诸部落。此时，虽存在海外研究，但规模有限，主要集中在体质人类学领域和博厄斯学派（Boasist School）。在体质人类学领域，赫德利奇

① 参见高丙中：《凝视世界的意志与学术行动——海外民族志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意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2—6页；包智明：《海外民族志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常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5—8页；王铭铭：《所谓“海外民族志”》，《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第116—129页。

② 周典恩：《国家意志与美国人类学理论的历史演变》，《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6期，第59—66页。

卡（Aleš Hrdlička）前往西欧对尼安德特人进行考古，前往白令海峡追踪先民的迁徙足迹；达文波特（Charles Benedict Davenport）则前往牙买加对黑人、白人和混血儿进行体质测量。博厄斯学派构成了美国人类学的主体，其研究呈现多元态势，如博厄斯（Franz Boas）的爱斯基摩人研究，米德（Margaret Mead）的萨摩亚人研究，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ean Herskovits）的贝宁、巴西、海地、加纳、尼日利亚和特立尼达考察，加米奥（Manuel Gamio）的中美洲研究，戈德曼（Irving Goldman）的菲律宾、哥伦比亚、波利尼西亚考察，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的吕宋岛考察，蒙塔古（Ashley Montagu）的澳大利亚原住民生育信仰研究，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在牙买加和海地的巫毒教研究，费-库珀·科尔（Fay-Cooper Cole）关于中国瓷器在菲律宾的相关研究等等。美国人类学大规模走向海外研究则发生在二战后。二战后，美国寻求全球影响力，需要了解全球可进入的诸民族诸文化。在此背景下，美国各大学人类学系的师生飘洋过海，从事海外田野调查，其学术传统持续至今。

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引进社会进化论算起，人类学在中国从翻译到研究，再到学科搭建，已经走过百年历程。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中国人类学或关于中国的人类学大致有四大面向，即汉人社会研究、少数民族研究、海外中国研究以及海外民族志。<sup>①</sup>“海外民族志”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词汇，出现较晚，但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早已起步，依发展路径而言，大体呈现出“出道即高峰，之后较沉寂，而今在探索”的态势。

海外民族志是中国人类学的一大面向，是基于学科创建而言的。学科创建前的前辈，如张骞、法显、玄奘、杜环等，为海外探索、著书立说做出的贡献，已经超越了海外民族志所能囊括的范畴。人类学

---

<sup>①</sup> 刘明：《海外民族志之于中国人类学的价值与意义》，《世界民族》2014年第6期，第30—39页。



学科创建之后,老一辈人类学家因其天资家学、中西兼修、因缘际会创造了海外研究“出道即高峰”的景观。之所以是“高峰”,既在于其海外研究的拓荒意义,也在于老一辈人类学家的许多海外研究成果被海内外同行评议、认可,他们本身也借此跻身海内外一流学术机构。尽管如此,老一辈人类学家从事海外研究的仍属少数,毕竟,多数人赴国外留学还是以中国社会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李济、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等皆是如此。<sup>①</sup>这些尚属少数的海外研究,按照研究对象可以划分为对海外华人社会的研究和对异民族文化的研究。对海外华人社会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吴景超调查华人街分析中国移民同美国主流社会关系的研究,<sup>②</sup>陈达前往东印度群岛、马来西亚、泰国、西贡等地对南洋移民问题的研究,<sup>③</sup>谭金美对落基山区华人社区兴衰的研究,<sup>④</sup>萧振鹏对在美华人洗衣业的研究,<sup>⑤</sup>田汝康对马来西亚婆罗洲北部的沙捞越华人社区的研究,<sup>⑥</sup>黄仁华关于华人学生在美交友和择偶的研究。<sup>⑦</sup>

对异民族文化的研究也在此时起步,老一辈人类学家的代表性研究有:1927年,李方桂随语言人类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前往印第安人居住区从事田野调查,提交报告《马朵儿,一种阿塔巴斯堪

① 王建民:《中国人类学的国内与海外:学术史及评述》,《中国研究》2012年第2期,第22—33、241—242页。

② Wu Ching Chao, *Chinatowns: A Study of Symbiosis and Assimilation*,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28.

③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此书最早一版为1938年版,另有1940年由Kelly & Walsh出版的英译本*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④ Rose Hum Lee,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Rocky Mountain Region*,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47.

⑤ Paul C. P. Siu, *The Chinese Laundryman: A study of Social Isolation*,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3.

⑥ Tien Ru-kang, *The Chinese of Sarawa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LSE Monographs on Social Anthropology, 1953.

⑦ Lucy Huang, *Dating and Courtship Innovations of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4.

语》，由此开启了对印第安语的研究；<sup>①</sup> 吴泽霖于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博士，研究了白种非犹太美国人对待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及行为方式；<sup>②</sup> 1935年，李安宅到新墨西哥州印第安人部落从事了三个月的田野调查，用中国学者的视角，质疑了美国人类学家以自身的竞争文化“以己度人”分析祖尼人的研究思路；<sup>③</sup> 戴秉衡以心理治疗为方法研究了芝加哥鸦片成瘾问题；<sup>④</sup> 杨庆堃则以芝加哥学派人文区位学的思路研究了美国的市场机构；<sup>⑤</sup> 抗战时期，林惠祥流落东南亚，在颠沛流离中从事东南亚考古和民族研究。<sup>⑥</sup>

除了基于长期田野调查的创作外，一些人类学家利用出访海外的机会，观察海外社会，通过游记、评论和演讲的方式，留下了该时段海外社会生活切面的素材。陈达1934年前往东印度群岛、马来亚、暹罗调研，记录了这些区域的风俗民情；1935年他游览苏联，记录下苏联社会的发展形势及工农生活。<sup>⑦</sup> 吴文藻1943年前往印度考察印度的民族问题和教族问题；<sup>⑧</sup> 1946年他前往日本，专题研究天皇制、财阀、日本工人运动和战后重建等问题。<sup>⑨</sup> 费孝通1943—1944年初访美国，考察美国社会和日常生活，并思考美国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sup>⑩</sup> 1946—1947年他重访英伦，对战后英国的政治和城乡生活进行

- 
- ① Li Fang-Kuei, *Mattole, an Athabaskan Langu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
- ② Charles L. Wu, *Attitudes Toward Negroes, Jews, and Orientals in the US*,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27. 另有中译本《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傅榛斐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 ③ Li An-che, “Zuñi: Some Observations and Queri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39, No. 1, 1937, pp. 62-76.
- ④ Dai Bingham, *Opium Addiction in Chicago*,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37.
- ⑤ Yang Ching Kun, *Marketing Institutions in Jackson Trading Area as Agencies of Community*,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38.
- ⑥ 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 ⑦ 陈达：《浪迹十年之行旅记闻》，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 ⑧ 吴文藻：《印度的社会与文化》，《文化先锋》1943年第2卷第18期。
- ⑨ 吴文藻：《吴文藻自传》，《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第44—52页。
- ⑩ 费孝通：《初访美国》，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观察。<sup>①</sup> 杨成志于 1944—1946 年选派赴美期间，访问人类学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各大学人类学部以及印第安人保留区，撰文介绍博物馆文化，也批判了美国的种族歧视。<sup>②</sup>

20 世纪 50 年代起，在冷战大背景及“一边倒”外交政策下，大陆人类学学科因院系调整而取消，海外研究进入沉寂状态。与此同时，身处美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人类学家则成了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的担当。这些海外研究主要有三种路径：海外华人社区研究、异民族文化研究和比较研究。1949 年，许烺光本欲前往华南从事田野调查，因战争未能成行，之后转到夏威夷研究华人社区。<sup>③</sup> 因田野调查地点上的限制，许烺光将关注点转移到中西方的比较上来，1953 年出版《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了传统中国文化和当代美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建立在社会情境之上，而美国文化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sup>④</sup> 1963 年根据在印度的实地研究，对中国、印度和美国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并阐释了宗族、种姓和俱乐部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sup>⑤</sup> 1964—1965 年前往日本研究家元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sup>⑥</sup> 海外华人社区研究依旧是海外研究的“重头戏”，李亦园前往马来西亚华人市镇生活，探究马来西亚华侨社会变迁和适应；<sup>⑦</sup> 黄树民研究泰北金三角华人社区如何寻找农业身份认同，并开辟新生活；<sup>⑧</sup> 陈祥水

① 费孝通：《重访英伦》，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 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

③ Francis L. K. Hsu, "The Chinese of Hawaii: Their Role in American Culture", *Transaction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 Vol. 13, No. 6, Series II, 1951, pp. 243-250.

④ Francis L. K. Hsu, *Americans and Chinese: Two Ways of Life*, New York: H. Schuman, 1953.

⑤ Francis L. K. Hsu, *Clan, Caste, and Club*,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3.

⑥ Francis L. K. Hsu, *Iemoto: The Heart of Japan*, Cambridge, MA: Schenkman Pub. Co., Inc.; [distributed by] Halsted Press, New York, 1975.

⑦ 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西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正中书局 1985 年版。

⑧ Huang Shu-min, *Reproducing Chinese Culture in Diaspora: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Petrified Culture in Northern Thailand*,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0.

则对纽约皇后区融入美国社会活动的新华人群体进行研究，与之前旧群体“孤岛”似的生活形成对比；<sup>①</sup>王保华等考察了温哥华、纽约、芝加哥、悉尼、秘鲁、哈瓦那、巴黎、里斯本、东京等地的唐人街，探究其在功能和性质上的历史变迁，尤其是探索当地社会在塑造唐人街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sup>②</sup>对异民族文化的研究，早期的代表是乔健对北美原住民族的研究，<sup>③</sup>而今，港中文等香港高校、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及其他高校除了延续海外华人研究外，也将东南亚、南亚等异民族文化纳入研究范畴。

随着改革开放、留学潮及人类学学科复建，人类学开始复苏。其时，民族志研究主要研究家乡和少数民族地区，关于海外的研究较少，老一辈人类学家又充当了先行者角色。1979年，费孝通再次访美，访问了10个城市，用20篇文章描绘了美国交通、中产阶级家庭生活、能源危机、黑人问题、计算机介入研究、新型市场等情况，抛出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时至今日亦具有前瞻性。<sup>④</sup>20世纪80年代，陈永龄利用参加国际学术活动间隙，展开对加拿大北部印第安人保留地的访问研究，发表了《觉醒中的加拿大印第安人》《记加拿大“第一民族”——印第安人》《北美印第安人心声》等文章，介绍了其历史、传统和现状。<sup>⑤</sup>除了以访问、间隙调研完成的研究外，前往海外读书或交流的学者也一并开启了海外研究，代表性人物是周敏、乐梅、胡军、庄孔韶和项飙等。周敏在美留学期间研究唐人街华裔的经济活力和同化问题，展示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帮助移民适应的唐人街

① 陈祥水：《纽约皇后区新华侨的社会结构》，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91年版。

② 王保华、陈志明：《唐人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③ Chiao Chien, *The Continuation of Tradition: Navaho and Chinese Models*,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969.

④ 费孝通：《访美掠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⑤ 参见陈永龄：《觉醒中的加拿大印第安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第94—100页；陈永龄：《记加拿大“第一民族”——印第安人》，《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第208—215、349—350页；陈永龄：《北美印第安人的心声——介绍〈第四世界〉及其著者》，《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第37—40页。



形象。<sup>①</sup>乐梅在罗彻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中产阶级女性通过手工编织制造与分享礼物的实践。<sup>②</sup>胡军转向医学人类学研究，比较苗族移民与同等数量白人阑尾穿孔手术的差异，解释医疗依从性问题。<sup>③</sup>庄孔韶在美访学期间观察并参与到美国詹森家族的生活，借鉴历史文献、书籍，同时穿插口传故事，写成通俗民族志《家族与人生》，描述美国知名家族的经商和生活史。<sup>④</sup>项飙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将目光转向印度 IT 劳工，探索劳动力如何调配适应资本全球快速流转的不确定性。<sup>⑤</sup>

“海外民族志”概念的提出及实践是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的一个新的探索，其不断被提及是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之后。北京奥运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巨人的兴起，也推动了人类学海外研究的发展。次年，世界人类学大会在昆明召开，中外人类学界交流更为频繁，中国人类学者到海外研究的自觉性和条件更为成熟。推动海外民族志发展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学术机构。自 2002 年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在高丙中指导下，以公民社会为学术取向，陆续前往泰国、马来西亚、印度、澳大利亚、美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等地进行海外田野调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除了独立派出博士生前往斐济、塔吉克斯坦、肯尼亚和乌干达从事田野调查外，还与“清华大学发展中国家博士项目”（项目自 2011 年创建，至 2017 年发展成为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合作派遣博士生前往坦

① Zhou Min, *Chinatown: The Socioeconomic Potential of an Urban Enclav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② Yue Mei, *We Enjoy Weaving: Person, Community, and Material Culture among Women Handweavers in Rochester, New York, US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1994.

③ Hu Jun, *Under the Knife: Medical “Noncompliance” in Hmong Immigrants*, Dissertation: Emory University, 2000.

④ 庄孔韶：《家族与人生》，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⑤ Xiang Biao, *Global Body Shopping: An Indian Labor System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桑尼亚、埃塞俄比亚、泰国、缅甸、老挝、印度尼西亚、古巴从事民族志研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及环南中国海研究院派遣博士生前往泰国、老挝、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越南和巴西从事田野调查。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则派遣教师和硕士研究生前往墨西哥、澳大利亚、古巴、埃塞俄比亚、桑给巴尔、波兰、尼泊尔、泰国、保加利亚、南非、耶路撒冷等地从事田野调查。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借地利之便，拓展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研究。广西民族大学也因地利之便，专注东南亚和跨境民族研究。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师生陆续前往博茨瓦纳、南非、卢旺达、坦桑尼亚、尼日利亚、苏丹等非洲国家从事田野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则以《世界民族》和《民族研究》为平台，为海外民族志提供学术成果展示机会。

老一辈人类学家和 20 世纪 80 年代后留学的人类学家，其海外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因缘际会，是个体能动性的结晶。这些成果丰富了对文化多样性的认知，但因时代和国力所限，难与国内学术界联动，未形成海外研究的趋势。与前辈学者通过海外留学或考察，因缘际会做海外研究不同，而今的局面是大陆高校自己培养的学者主动到海外去，做规范的民族志。此时，海外研究既有中国“走出去”的时代召唤，也有国内高校支持海外田野的条件成熟。在此背景下，从事海外民族志的学者以满天星斗的布局开启了对海外社会的探索。笔者在肯尼亚从事的土地冲突研究即是当代海外民族志旗帜下的产物。接下来，笔者将以坦诚的笔触解剖田野工作，展示从事海外研究的幼稚、焦虑及策略，以期完成对学术共同体的个体责任。

## 二、研究选题与研究问题的探索

尽管去海外做田野可以成行，但落实起来却困难重重。于研究本质而言，海外民族志与国内民族志没有任何区别，都是“提出研究问

题—理论对话—搜集田野资料—指出核心发现—批评反思”的一整套学术范式。但对研究前置条件而言，两者在社会规则、风俗习惯、安全、语言、资料呈现等方面却大为不同。这些前置条件的差异也注定了不同的选题策略。

选题策略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假设先行，之后验证；另一种是放空自己，真实感受。前者的代表性研究是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青春期躁动之前被认为是生物学和荷尔蒙因素，不可避免。米德从质疑这一一般性假设开始，前往萨摩亚地区寻找反例来证伪，从而肯定博厄斯学派视人类行为情境由文化决定的观点。<sup>①</sup> 后者的代表是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马林诺夫斯基未预设研究问题，而是秉持文化整体观对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经济活动、社会组织、巫术力量、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等进行全面调查，最后着重描绘“库拉贸易”这一主要选题。<sup>②</sup>

投射于己，之前在国内从事田野调查，在对某一主题产生兴趣之后，笔者一般会先大范围搜集地方志和网络资料，确定研究假设问题，之后与对方机构或负责人建立联系，背上行囊，即日启程。观察也好，访谈也罢，系谱制图，文字誊录，或追溯生命历程，或展示生计模式，或挖掘社会组织，或融入信仰世界，分类整理，文本分析，最后呈现民族志的样貌。而身处海外，研究者方能深切感受到之前在国内从事田野调查存在习以为常的属性。习以为常尽管遮蔽了国内研究的一些细节，但也为研究提供了一种简化机制。当研究者对海外社会秩序没有切身体验时，依靠历史描述和新闻报道所构建的知识在遇到真实的海外社会情境时往往被冲击得粉碎。在此情况下，假设先行的研究思路走不通，只能先采纳文化整体观叙事，而后从中寻找学术兴奋点。

---

① 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周晓虹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10页。

②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弓秀英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22页。



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在于将基于田野调查的民族志视作获取社会和文化新知识的最重要来源。选题的生命力往往立足于真实的田野现场。2018年11月—2019年5月，笔者第一次去肯尼亚，期间遭遇恐怖袭击1次，被警察逮捕2次，被索贿多次。笔者心想：这可能是初来乍到的“学费”，等熟悉情况后自然诸事顺遂。得益于跟随清华大学全球丝路健康团队参加学术活动，肯尼亚东海岸的基利菲镇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基利菲镇虽说是基利菲郡的郡所，但依建筑而言只能说是一露天市场，除了银行、医院、郡首办公楼、法院、教堂、清真寺外，与乡村配置无异。而作为一种公共空间的俱乐部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些俱乐部星罗棋布，或简或繁，有白人殖民者遗留的基利菲俱乐部（Kilifi Club），有白人后裔新修的集帆船、住宿、酒吧、娱乐为一体的水塔俱乐部（Mnarani Beach Club），有只在夜间提供音乐和酒精服务的V酒吧（V-Lounge），有提供饮食、啤酒、电视服务的市场内部俱乐部，有只提供自酿椰子酒（coconut wine）的乡村俱乐部。其中，乡村俱乐部分布最为广泛，很多村落至少有三五个，不过其建筑结构简单，以四木柱垂直撑框架，四木相交搭屋顶，并捆束椰子树叶覆盖于上，内置原生态木桩或将原木横放，充当座位，老板娘当垆卖酒，顾客肆意调笑，兴致所起则于外手舞足蹈。为俱乐部赋予历史感的是基利菲向南蒙巴萨旧城的一铜质铭牌，铭牌上书“蒙巴萨俱乐部 1897”（The Mombasa Club 1897）。蒙巴萨俱乐部是百年前英国修建乌干达铁路时所建，既是欧洲商贸人员、政府官员、传教士的住所，又是英国在滨海地区拓展政治影响力的据点。<sup>①</sup>英国的势力沿着乌干达铁路延伸，俱乐部如影随形，充当权力空间。而今，各种类型的俱乐部在沿海地区遍地开花，超越了原来的殖民和

---

<sup>①</sup> P. J. L. Frankl, “The Early Years of the Mombasa Club: A Home Away From Home for European-Christians”, *History in Africa*, Vol. 28, 2001, pp. 71-81.



政治属性，成为具备信息交换、休闲娱乐、音乐展示、农业手工业产品售卖、性伙伴选择等功能的公共空间，或许可以基于此确立一个俱乐部公共空间变迁的选题。

海外社会的陌生感与研究者的局限性注定了研究选题不可能从一而终。2019年1月，笔者重访基利菲，遇到镇中心法院门外百人聚集：有背负幼儿的妇女，有偏坐摩托的青年，有蹶来蹶去的幼童，有老成稳重的长者，有席地而坐的老妪，有比划姿势的男人。而其中一个站着且是唯一一个西装革履的人则显得与众不同，此人手臂夹着一堆文件，因天气炽热，脱下了西装上衣，耷拉着领带。笔者上前与之攀谈才知：此人为律师，受凯瓦帕（Kiwapa）村聘请来打土地官司。念及村庄名字时，笔者想起管家（housekeeper）就是这个村的人。经过多方询问，终于厘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当地政府意欲发展地方经济，贱价收购凯瓦帕村的土地办厂，答应盈利之后补偿村民。而后政府从银行贷款建厂，可归还不了贷款，土地和厂房被银行收缴。银行转手将土地和厂房作价卖给了一个印度商人。印度商人自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就红红火火地办起了腰果厂。此时，土地掺杂的复杂权益矛盾开始发酵，在数次交涉无果后，凯瓦帕村长老带着本地数百村民，占领了厂房旁边的土地，测量之后，私分了土地。“暴动”当天，印度商人瑟瑟发抖，但出于保护财产的心思，还是将凯瓦帕村告上了法院，要求驱逐“非法占地者”。回到住所，管家阿米娜（Amina）向笔者讲起了基利菲土地的故事。殖民时期，基利菲地区有三个大地主，一个是英国人威尔森（Wilson），现在其后代依旧占据当地最大的种植园（Plantations），当地人要求收回这片土地，在2018年还发生过冲击占领事件；另一个是英国人麦克琬（Meckwan），肯尼亚独立之后，他跑回了英国，将土地给了基库尤人（Kikuyu）管家乔客亚（Johnkia）；第三个是一个阿拉伯人，肯尼亚独立不久，他被米基肯达人（Mijikenda）砍了头，土地也被瓜分。由此，土地冲突也作为一个选题映入笔者的脑海。

俱乐部公共空间和土地冲突选题初步确定之后，笔者就此与导师商议。导师认为：肯尼亚通过和平协议获得独立，除“城头变幻大王旗”，黑人取代白人执掌政权，赢得民族政治独立外，社会肌理并未经历深刻变革，反而因失去强力殖民压制，部落与国家、黑人与白人、农耕部族与游牧部族、外来资本与本土社会之间的土地矛盾更为错综复杂。以土地冲突为选题，能够折射出肯尼亚土地制度的历史延续性，也会成为理解非洲社会的一个窗口。更为重要的是，好不容易去趟非洲，就是要做基础研究，就是要研究社会痛点、研究社会主要矛盾，这对中国海外研究而言就是拓荒，不能赶时髦地做一些布尔乔亚式的研究。最终，土地冲突的选题被确立起来。

研究选题不等于研究问题。提出研究问题，需要经历将具体案例上升到普遍性问题，并将问题学术化的过程。笔者所提出的研究问题是肯尼亚诸行动者（政府、农牧民、商人、殖民后裔等）如何通过建构史学来塑造土地产权正当性。提出这一问题经历了“具体案例—普遍事实—产权呈现—理性主义解释乏力—追溯历史”的思维过程。根据所见所闻，笔者列举了关于农牧民冲突、森林人土地问题、土地私有制与公有制之争、殖民后裔土地归还问题、“夺回祖先土地”口号下的土地惨剧等五个故事。

2020年，梅鲁郡。因蝗灾、干旱威胁生计，牧民内迁占据部分农地，当地农民视其为外来者和入侵者，土地纠纷爆发。梅鲁郡警察前往调停，遭到300多人攻击，9名警察受伤。

2020年7月，肯尼亚森林局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名，驱逐在森林里生活的奥吉克人（Ogiek），致使600多人无家可归。然而，2017年5月，奥吉克人在非洲人权法院胜诉，保有茅森林（Mau Forest）的土地，肯尼亚政府允诺执行。

2019年，米戈利郡。入侵者袭击中国商人创办的金矿开采营地，造成华人员工一死二伤。起因是，原土地所有人的



30 多位亲戚认为，当地官员和中国商人精心策划向原土地所有人其中一个孙子非法买地，侵犯了家族利益。之后，集体示威、入侵事件频发，最终酿成惨剧。

2018 年，基利菲郡。最大的农场 Plantations 历时 99 年的租约到期，却依旧被殖民者后裔占用。上千村民揭竿而起，占领农场，瓜分土地。肥硕的英国农场主克里斯奥弗（Christopher）招来警察驱逐，并逮捕了带头的 14 个人。

2017 年，裂谷地区。大选前，在村庄遭受袭击后，肯尼亚村民杰拉尔德·迈纳（Gerald Maina）手持砍刀，在田间地头巡逻。2008 年，面对卡伦金人（Kalenjin）挥舞的砍刀，成千上万的基库尤人挤进卡车，虎口逃生，而道路两旁留下的是烧焦的房屋和空旷的农田。1992 年，同样是大选之年，在“夺回祖先土地”的口号下，卡伦金人抡起砍刀，砍杀了数百基库尤人。

与东非其他国家相比，肯尼亚是一个相对和平的国家，自 1963 年独立起没有遭遇过成气候的叛乱，更没发生过内战。然而，上文所列举的冲突案例，却揭示出这个和平的国度深受暴力冲突困扰的现实。在这些冲突当中，土地冲突最为激烈，并导致持续的流血和死亡。个案上升到普遍事实需要数据支撑。根据 UCDP（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数据，从 1989 年到 2019 年，肯尼亚社会冲突导致 5901 人死亡，其中 4313 人因争夺土地、牲畜和水源而丧命。<sup>①</sup> 在地理分布上，土地冲突事件主要分布在西部裂谷地区、沿海地区和北部边境。但整体而言，土地冲突事件星罗棋布，几乎遍布全国，成为

---

①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计划（UCDP）由乌普萨拉大学制作，是世界上有关有组织暴力的主要数据提供者。搜集数据的分析单位是“事件”，纳入统计的事件必须满足“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武力冲突事件至少导致 1 人直接死亡”。数据来源于道琼斯 Factiva。（道琼斯 Factiva 是全球最大和历史最久的新闻及公司数据库，收录了全球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以 28 种语言出版的 36 000 多种信息资源。）



一种普遍性的社会事实。肯尼亚这个相对和平的国家为土地冲突所困扰，这就有必要去分析土地冲突个案背后的历史与制度矛盾：梅鲁郡的农牧民冲突折射出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不同文明形态争夺生存权的斗争；政府对奥吉克人的驱逐则是自英国殖民时代起，国家压缩森林人生活空间、争夺森林山川政策的延续；米戈利郡金矿开采引发冲突的背后则是传统土地公有制和私有制在土地处置权方面的争论；基利菲村民入侵农场则可追溯到本土社区与殖民主义的百年恩怨；裂谷地区部落间的血腥屠戮则归因于部落迁徙及定居所诱发的原居民的土地委屈。

正如米尔斯所言，“没有资料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理论的资料是盲目的”。民族志材料与理论之间的羁绊关系是所有经验科学的基础。林哈德（Godfrey Lienhardt）认为民族志材料与理论的关系如同“大象炖兔子”，而烹饪技巧在于调出兔子的味道。<sup>①</sup>这一比喻一方面阐明了民族志材料与理论的比重，另一方面则强调了理论的阐释价值。根据土地冲突的成因与行动者的诉求，土地冲突事件与产权理论建立起了联系。《吕氏春秋·慎势》言：“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sup>②</sup>土地与兔子一样，当其“分已定”，纷争止息；而当其“分未定”，处于模糊状态时，则冲突不止。这个“分”，就是产权。类似的表述，学界比较流行的是“巴泽尔困境”，即如果产权制度界定不清且没得到良好执行，人们必定争相攫取稀缺的经济资源和机会。<sup>③</sup>两种学说流程度量的强弱是一种学术话语权的格局，而其内容的一致性却说明了产权制度与冲突之间关系的普同性。这也就是说，上述土地冲

① Godfrey Lienhardt, "From Study of Field, and Back",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Jun. 7, 1985.

② 吕不韦：《吕氏春秋》，陆玖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12页。

③ 约拉姆·巴泽尔：《国家理论——经济权利、法律权利与国家范围》，钱勇、曾咏梅译，石磊审订，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页。

突事件背后，其实都可以追溯到“谁是土地所有者”的争论。

“谁是土地所有者”在法典层次的讨论是一种理性主义的选择。肯尼亚是一个法制齐备的国家，在土地制度方面表现地尤为突出：在法律渊源方面，2010年《宪法》(Constitution of Kenya)、《社区土地法》(Community Land Act)、《森林保护和管理法案》(Forest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Act)、《官地法》(Government Land Act)、《土地获取法案》(Land Acquisition Act)、《土地产权条例》(Land Title Ordinance)、《国家土地使用政策》(National Land Use Policy)、《信托土地法案》(Trust Land Act)、《土地注册法案》(Registered Land Act)等颇为完备，且有明确清晰的法律位阶体系和适用标准；在法律内容方面，以上法律文本涉及土地的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等内容，并对各项权利做了详细的制度安排；在机构设置方面，成立了专门的环境与土地法院，地位与高等法院相同，专门审理环境与土地相关的任何争议；在技术支持方面，国家土地委员会(Nation Land Commission)、诸大学、郡政府等为土地的丈量、制图、调研、评估、监督等工作提供技术服务。按照肯尼亚的土地立法和设施配置来看，肯尼亚土地制度并非颟顸之作，而是理性的产物。理性，在韦伯看来，是科学、现代技术和科层制发展的整体状况，依据效率原则，以技术性知识为基础来组织社会和经济生活，并将社会的一切纳入可预测、可计划、可计算的轨道。<sup>①</sup>肯尼亚土地制度在法律渊源、法律内容、机构设置、技术支持等方面的配置，显示了肯尼亚拥有齐备且等级明确的法律体系和恪守科层制精神的官僚系统来维持秩序，这种秩序设置已经摆脱了传统和权宜之计的痕迹，构成一种法理型支配的关于土地产权的正当性秩序。然而凝结着血泪的全国性土地冲突事件却昭示着理性主义分析的

---

①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03—239页。



乏力，这就是说，真实的土地产权并不像“理性的法律制度”所规定的那么明确，而是充满各种力量和思想的博弈，理性主义无法囊括土地产权的解释权。

殖民统治、反抗斗争、政治精英继承殖民遗产，以及部落冲突等历史塑造了今日肯尼亚的土地制度。现行土地产权的正当性和明确性，主要是针对既得利益群体（殖民时期的“白人老爷”，独立之后的政治核心家族和核心民族）而言的，核心在于维护现有土地占有形态的秩序，忽视历史上失地群体的利益本就是应有之义。如果从失地群体的角度来看，他们对土地冲突的参与并非如发情期的野兽一般，暴虎冯河、肆意而为，他们或否定历史上土地的转让效力，或声称夺回祖先土地，其背后皆有自圆其说的土地产权理念和规则在指引。这种理念和规则并不是凭空而作，而是凝结着一个族群的共同情感和价值观，也是这个族群土地历史记忆的一次次重启。这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土地冲突背后，都潜藏着历史的魅影。“追溯历史—明确产权—化解冲突”被视作解决土地冲突问题的良方。然而，“追溯历史”意味着土地史料的重新筛选和组合，意味着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重塑，也意味着历史成为一种直接与产权挂钩的资本。如此，行动者如何利用历史建构土地产权正当性就成了研究的问题。

### 三、田野调查策略

田野调查策略涉及方法论的讨论，而不同的文化场景需要不同的策略，不可一概而论。清华大学张小军教授在“文化人类学”课程上曾言：“人类学方法？尽管各种书籍上写这种方法，那种方法，其实都是抽象后的建构。田野生活更为复杂，不是几个方法所能涵盖的。等你会过日子，搞好生活，自然也就搞好人类学了。”上课时或因缺乏规范性而质疑“过日子”，可等研究者完全置于一个陌生环境，需要维持生计、沟通交流、搭建关系、完成学术任务时，对“过日子”



就会有不一样的理解。置身于陌生田野,研究者为了“过日子”,至少需要熟悉田野点的历史和现状,需要注意自身角色定位,需要明确资料的获取方式,需要学会规避风险。

人类学大部分信息来自日常交往过程而不是正式的采访,这就需要选择田野点长期生活。传统上,人类学者选择一个田野点,待上至少一年时间,融入当地生活,经历一个周期的生产实践和岁时节日,对宗教、政治、经济和亲属关系等进行全面描述,最终完成民族志作品。而今,民族志的总体财产已经覆盖大多数地区,对社会全貌进行详细研究的范式不再常用。<sup>①</sup>随着学科内部越来越专业化以及不同地域联系的强化,专题研究取代了全面研究,同时,田野地点也开始突破一地的限制,对“多点民族志”乃至“全球民族志”的反思也开始建立起来。相对而言,“多点民族志”更能展示文化的多样性,也更能体现研究问题的代表性,但也存在着与“一点民族志”相比缺乏田野质感的问题。选择“一点”,还是“多点”,既取决于研究的问题,也取决于研究者的个体能力。笔者在肯尼亚研究土地冲突面对田野点选择时也曾陷入纠结:单独选择一个田野点可能会导致以偏概全,选择太多田野点又可能令研究浅尝辄止。因精力、财力、人力所限,笔者决定选择两个主要田野点常驻,如果附近地区有土地冲突的消息,则前往实地观察和访谈。2019年1月—4月,常驻基利菲,2019年12月—2020年7月,常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主要是米利玛尼(Milimani)土地法院。以基利菲镇周边地区为田野点,可以更为全景式地了解一个地域的生活场景,更深入地了解土地冲突在地方社会的呈现方式。选择首都内罗毕土地法院蹲点,则能够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土地冲突案例,能够更为多样地了解土地冲突形态。

研究者置身陌生田野,一般不是立即展开专题工作,而是要本着

---

① 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小地方,大论题》,董薇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49页。

文化整体观了解田野的“纵”与“横”。“纵”指的是田野点的历史，“横”指的是田野点现今的生活切面。了解历史，方能洞悉土地冲突参与者及其土地诉求的渊源；了解生活切面，方知目前土地矛盾为何尖锐。了解历史和现状最简洁的方式是阅读地方志，这在国内做研究时可以说是事半功倍。然而做海外民族志时，需要有一个预期，就是修志并不是一个普遍性的传统。笔者进入基利菲走访图书馆、博物馆、书店、法院寻找地方志，最后一无所获。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只能依靠参观遗址、寻找文献中关于该地区的只言片语的方式完成历史拼图。虽无太多本土文字资料记载，但是遗址及各族群互动的事实证明基利菲是一个拥有长远历史的地域。境内的水塔遗址（Mnarani ruins）和盖德遗址（Gedi ruins）昭示着10—16世纪斯瓦希里城邦文明的存在，其中出土的中国瓷器以及伊斯兰陶器、珠子、硬币也显示了印度洋贸易圈的活跃。境内北部的马林迪以及南部接壤的蒙巴萨被认为是郑和下西洋的终点，其中马林迪（麻林地）也是中国史书记载的“麒麟”（长颈鹿）的来源地。<sup>①</sup>地理大发现时代，1498年，达·伽马被蒙巴萨城邦驱逐，后被马林迪城邦招待，并在本地向导带领下“发现”印度；接下来是葡萄牙对蒙巴萨的征服和本土人的反抗，以及葡萄牙传教士在温驯的马林迪传教。百年后，阿拉伯地区的阿曼帝国舰队南下，驱逐葡萄牙人，视东非沿海为其势力范围。1824年，赛义德·本·苏尔坦·阿勒布赛义迪苏丹（Said bin Sultan Al-Busaidi）在桑给巴尔建都，1856年，他去世后，阿曼帝国分家，一子占据马斯喀特和阿曼，另一子占据桑给巴尔，东非海岸被桑给巴尔苏丹国视作领土；1890年，桑给巴尔苏丹国被英国宣布为保护国，随着1895年和1920年肯尼亚被宣布为东非保护国和殖民地，相应地，基利菲郡的十英里海岸带隶属保护国，英国每年向桑给巴尔苏丹缴纳租金，

---

<sup>①</sup> 李贤、万安：《大明一统志》（影印本）卷九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24—30页。



而其余部分则成为英国殖民地的一部分。随着乌干达铁路的修建，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来此做劳工，并拓展在医药、金融、教育、销售等方面的生存空间，但英国人担心印度人“异域建国”的可能，严格限制印度人参与土地经营。随着英国人的土地开发和异化政策的开展，从16世纪起就陆续从传说中的索马里辛瓦雅（Shingwaya）地区迁徙到此的米基肯达人被迫成为“非法占地者”。<sup>①</sup>20世纪60年代，肯尼亚独立前夕，沿海政治精英组成非洲海岸政治联盟（Coast African Political Union），并加入主张地方分权的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KADU），肯尼亚独立后，主张中央集权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KANU）执政，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解散，并加入非洲民族联盟，之后关于集权和分权的讨论从未在肯尼亚政坛缺席，基利菲郡隶属于肯尼亚八省之一的滨海省（Coast Province）。2010年，以地方分权为特征的新《宪法》出台，省制取消，基利菲行政区与马林迪行政区合并，成为47个郡之一的基利菲郡。在现今越来越理性化的世界，即便在偏远地区，当地政府也会开展社会普查，这对了解“横”的生活切面提供了方便。生活切面的各切面纷纭复杂，传统上人类学研究往往撷取亲属制度、生计模式、宗教信仰、政治组织等四大切面完成对该田野的大致理解。另外一个田野米利玛尼土地法院与涵盖整体生活的完整社会不同，是一个专门化机构，对该机构的理解则需要关注其历史、成立依据、基本职权。米利玛尼土地法院位于首都内罗毕，内罗毕之前是乌干达铁路铺设时的仓库和周转中心，1907年，英国殖民政府将统治中心由沿海蒙巴萨迁移到此，自此内罗毕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sup>②</sup>米利玛尼土地法院设立的依据是2011年第19号法案《环

① 参见 Thomas T. Spear, *The Kaya Complex: A History of the Mijikenda Peoples of the Kenya Coast to 1900*, Nairobi: Kenya Literature Bureau, 1978; Martin Walsh, "Mijikenda Origin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Transafrican Journal of History*, Vol. 21, 1992, pp. 1-18.

② Claire C. Robertson, *Trouble Showed the Way: Women, Men, and Trade in the Nairobi Area, 1890-199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境与土地法院法案》(Environment and Land Court Act)第四条:设立法院,(1)建立环境与土地法院;(2)法院应与高等法院同级;<sup>①</sup>(3)法院在整个肯尼亚拥有并行行使管辖权。土地法院审理和裁决任何跟环境和土地相关的争端,还有权审理与公共、私人 and 社区土地以及合同有关的案件,诉讼选择或授予土地任何可执行权益的其他文书。目前,肯尼亚全国有28个土地法院,分布在各主要城镇。在专门的土地法院设置前,与土地相关的争端案件由普通法院管辖和处理。尽管土地法院为单独设立,在地位上与高等法院平起平坐,但并没有单独建造新的法院设施,米利玛尼土地法院日常办公和审判跟米利玛尼高等法院在同一建筑物内。

人的社会角色因社会场景的变化发生流变,角色的改变往往带来互动策略的改变。研究者进入田野角色,既来源于自身的定位,也受田野对象的影响。现代人类学一直强调文化相对主义,研究者应该本着肯定异域文化的态度从事田野调查,然而奠定此范式的马林诺夫斯基却以带有“鄙夷”之态度记日记的方式对此价值展开了暴击。研究者毕竟是普通人,有正常的喜怒哀乐,其对田野对象的真实态度也千差万别,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严肃地描述当地文化。身处田野,笔者扮演的是一个“无用且无害,多少有点帮助”的角色:有害的角色为社区所不容,无法开展田野;太过有用又会干扰价值立场和研究进度。田野地点的不同会造成研究者的角色和行为的差异。基利菲镇及附近的村落是熟人社会,因租房、交通、消费、社交等“过日子”关系,笔者能迅速与当地村民、司机、老板、教师、警察、律师等建立联系,对方能确认笔者这个“无用且无害,多少有点帮助”的角色的存在,也能为田野调查提供默认或简单说明的支持。内罗毕是大都市,一个陌生人社会,需要规则调整行动者的行动。法院毕竟是国家

---

① 肯尼亚的法院体系分为四级,一到四级分别是最高法院,上诉法院,高等法院、环境与土地法院、就业与劳动关系法院,地方法院、卡迪司法院(管辖权仅限所有当事人都是穆斯林)、军事法庭以及根据国会法案设立的地方法庭。



公器，一个毫不相关的外国人进入需要研究许可，否则会导致签证不合格而被逮捕。在去肯尼亚之前，笔者已经拿到了阿迦汗大学的邀请函，但是办理研究签证却颇为拖沓。2018年11月，在到达肯尼亚的第三天，笔者随阿迦汗大学的工作人员一道去移民局提交了材料，官方规定3个月内办妥，然而直到2019年5月，签证才有消息，且只给了6个月有效期。2019年12月，笔者第二次去肯尼亚，研究签证已然过期，重新申请耗时过长，会造成延误。绕开移民局，征得土地法院同意或许是条捷径。笔者到市中心的肯尼亚最高法院询问调研所需手续。结果被告知，没有研究签证许可，不能前往法院调研。此时，习惯跟人唠嗑的人类学属性起了作用，最高法院工作人员偶然间谈及米利玛尼法院里面有个法律图书馆，以学校的名义申请可以进入。逮到机会，笔者经历三道手续——阿迦汗大学开具介绍信、最高法院许可盖章、米利玛尼法院图书馆发放邀请函——拿到了邀请函，获得了一个可以参与观察土地法院的角色。

田野材料是民族志的基石，选择何种研究方法都是针对搜集田野材料而言的。进入海外田野，搜集何种材料存在焦虑，这种焦虑逼迫研究者不得不尽可能多地搜集材料，相关的、不相关的、吉光片羽的，都会纳入搜集的范畴。此方式不可持久，毕竟这种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不是单枪匹马所能承担的。在读了各种当地新闻之后，在逛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市场、农场、村庄之后，在当地切切实实生活过之后，研究者对田野材料的出处可能就会大体有个把握。此时，基于搜集资料的研究方法才能产生。为了搜集土地冲突相关材料，研究具体采用了参与式观察、访谈法、文献法、GIS（地理信息系统）方法、口承族谱法和遗迹联想法。

参与式观察是人类学最重要的方法，研究者生活在所研究的场景之中，参加社会生活，观察土地冲突事件和土地法院如何审理土地冲突案件。除了在基利菲参与日常生活和在米利玛尼土地法院观察庭审以外，在材料是否充足方面的焦虑逼迫笔者根据《民族日报》（*Daily*

*Nation*)、《标准报》(*The Standard*)、《星报》(*The Star*)这几个覆盖全国的报纸和道听途说的土地冲突事件,进行选择性追踪。访谈法指的是询问不同群体对土地归属的历史认知、对土地冲突事件来龙去脉的解释,访谈对象涉及土地冲突案件的利益相关者、律师、法警、地方长老、村民和肯尼亚学者。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土地冲突事件,研究者需要通过滚雪球的方法,拓展访谈对象,获取更为多元的解释。文献法指的是对殖民以来的政府档案、传统口述资料汇编、土地成文法、当地学者和西方学者的土地冲突研究资料进行搜集和整理,主要做五项工作:一是前往内罗毕国家档案馆(Kenya National Archive)和米利玛尼法院图书馆查阅肯尼亚被英国殖民以来的年报,着重关注土地政策的变化和殖民政府对土地的控制;二是前往国家法律报告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Law Reporting)搜集肯尼亚关于土地问题的成文法,以及在数据系统中录入的土地冲突案例;三是根据田野点的设置,了解基库尤人、马赛人(Maasai)和米基肯达人的习惯法,这部分材料来源为肯尼亚国家文化署的传统习惯法编纂、口述资料,以及其他科研机构整理的习惯法档案;四是搜集非洲本土学者和西方学者关于土地冲突的研究;五是从当地报纸搜集典型性土地冲突案例。GIS方法是借用地理学的方法,根据肯尼亚媒体报道的土地冲突事件,绘制肯尼亚土地冲突事件分布图,明确土地冲突发生地点、持续时间、冲突缘由、相关利益人、造成的损失等信息。其呈现不仅是为了显示土地冲突具有普遍性,借此造成视觉冲击力,也是通过建立数据库的方式分析土地冲突事件的规律。口承族谱法指的是借鉴肯尼亚的口承文化,通过长老或当地知识分子从族谱历时角度阐释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的认知。之所以借鉴此方法,是因为在基利菲镇调研时,发现米基肯达人的命名呈现“个人-父亲-祖父”联名制的特点,当其追溯历史、明确记忆刻度和确定身份之时,经常以命名为坐标系。遗迹联想法本质是延伸个案,通过历史遗迹,如城堡、塑像、墓碑、遗址和故居,触摸彼时的历史,回应而今的秩序。如从耶万吉塑



像可以追溯印度移民史；从凯伦故居可以追溯欧洲移民圈地史；从蒙巴萨俱乐部可以追溯乌干达铁路建设侵地史；从卡亚（Kaya）墓地布局可以追溯米基肯达人的传统秩序；从曼扎塑像可联想女性挖掘历史资源，为争地建构正当性的努力。

身处异邦，生活情境和社会规则骤变，研究者以自身社会内化经验在异邦行事会出现诸多问题，甚至会有牢狱之灾，风险规避不可不察。入关和出关是违禁品审查和“讨要好处费”的高发场景，尽管许多人有过付“好处费”通关的先例，但并非每次都奏效。违禁品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熟知的枪支弹药、象牙及毒品，也可能涉及常见的槟榔、动植物标本。研究者，尤其是日常生活复杂的研究者，前往海外需要读一下违禁品目录。进入田野，庇护人的寻找需要提上日程。庇护人可以是当地学校的老师，也可以是村庄的头人，最好是参与公共事务且有一定声望的人。通过庇护人背书，研究者能够获得一个进入社区的身份，同时也保障研究者出现意外时有保证人。在基利菲法庭观看庭审时，笔者曾被法警以貌似索马里青年党为借口逮捕，此时，庇护人去保释的作用就体现了出来。人类学重在现场感，重在文化多样性的体验，意外自然被视作田野调查的必要环节。在被限制在铁笼旁的短暂时间内，笔者对讨要好处者有了一种不一样的看法。讨要好处，在一些国度，不是个体现象，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不能贸然对个体进行价值判断。反向思维，多数讨要好处者往往健谈，乐于讨价还价，很容易被发展为报道人。当笔者与法警建立联系之后，对方回馈了一些当地“巫术弑老”的信息，为笔者的工作开辟了一个新方向。海外民族志的实施主体往往是来自相对发达地区的学者，而前往的往往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田野对象不可避免地会提一些要求。面对这些要求，力所能及的公共事务可以答应，而私人事务则需谨慎，因为这可能带来不可控的结果，最终打断研究计划。田野对象萨明（Sammy）曾要求笔者投资“灌溉项目”：萨明规划起蓝图，要求笔者投资三万先令购置大型塑料储水罐和输水管，然

后在土地旁边搭建高台放置储水罐，当自来水放水时，铺设输水管，用抽水机将水打入高台储水罐，以此灌溉，循环往复，土地无论种植玉米、土豆，还是瓜果蔬菜，皆能丰收。当笔者以投资回报反问时，萨明突然间有些支吾不清，最后说了一句，“我们是朋友，再说，你们中国人不就应该援助我们吗？”笔者最后拒绝了这一要求，不是因为担心没有投资回报，而是担心这会导致笔者为社区所不容。萨明的灌溉计划如果得以实施，的确对其个体有利，若他人纷纷效仿，自来水资源必然短缺，会产生新一轮的争水冲突，最终提供资助的笔者可能会受到整个社区的敌视。以上列举几例及其可能导致的风险，但无法穷举，只能镜鉴研究者的遭遇，尽量规避干扰田野调查的风险，但对注重现场感的人类学者而言，一些可能深化田野的风险应该主动接触。

田野调查不是按部就班的过程，信息也不是唾手可得的果实。在一年多的田野过程中，研究者经历千百次的观察、上百次的访谈，而最终纳入论文的只是一部分资料。田野材料的学术转化是一个选择性筛选的过程，筛选的不同方式也对应着民族志不同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对话。田野和理论的动态博弈为论文主题的转化提供了可能，但也会因关注偏差导致材料欠缺。材料欠缺有的可以依靠回访补足，而有的只能留下永远的遗憾。

## 四、展望

作为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新的面向，海外民族志因逢其时而渐成规模。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区域国别学”纳入第14类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海外民族志从事海外研究的属性与“区域国别学”不谋而合，在一定程度上，“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制为海外民族志赋予了合法性保障。然而，海外民族志研究依旧面临着诸多挑战。探索期阶段专注经验积累的特点和学科与智库的衔接关系构成



了内部挑战。从事海外民族志的学者在更具挑战性的学术和生活压力之下，向海外踏出一串串脚印，对话一家家学说，分析一个个案，拓展了新知识的边界，但因海外民族志尚处于经验积累阶段而非经验总结阶段，尚未提出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区域国别学虽然已经建立，但作为法学、文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在理论建构、研究范式、田野实践和知识生产方面尚未实现有效的互动，与智库之协作依旧处于摸索期。对于今日中国而言，海外研究的重要性和意义已经不用赘述，然而目前学术界的两种趋势却让诸多从事一线海外研究的学者陷入困惑，这也构成了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外部挑战，一种是西方理论至上，另一种则是空喊抵制“西方话语霸权”的口号。西方理论至上的范式应该摒弃，中国人类学者走向海外，不仅仅要了解西方话语，更要重视本土学者的观点，还要审视作为中国学者的“第三只眼”。<sup>①</sup>空喊抵制“西方话语霸权”的文章而今大行其道，甚至掩盖了真正的一手海外研究。更有甚者，这种口号体作品已经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写作范式：喊一个口号，谈一个概念，报一组历史“菜名”，联系一位或数位人类学大家的“只言片语”，再抨击一下“西方话语霸权”的价值理念。可是这种缺乏一手田野材料的作品，空有一腔激情，不仅不利于异域知识的生产，也妨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在内外挑战之下，海外民族志真正与国运相通，真正成为海外研究的主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杨崇圣）

---

① 景军：《南部理论：人类学思想的他者建树》，《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第77—92、145页。

## **The History, Question and Fieldwork Strategy of Overseas Ethnography: Based on Kenyan Case**

Qi Tengfei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limited conditions of the times, overseas research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which appeared in the 1930s, has not formed research conventions. Nowaday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overseas ethnography and the overseas fieldwork promoted by Chinese universities, overseas ethnograph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large-scale, and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Due to the problems of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researchers training and language learning, overseas ethnography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Based on fieldwork in Kenya,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researcher's anxieties to choose the research topic and confusion to clarify the question, and discusses strategies for selecting field sites, determining research methods and avoiding risks, to provide a case study for overseas ethnography.

**Keywords:** Overseas Ethnography, History, Kenya, Research Question, Fieldwork Strategy